

·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 ·

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挑战与实践路径^{*}

杨润聪

【摘 要】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背景下，人类社会的发展面临方向性抉择。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应对变局的中国答案，致力于扬弃西方资本逻辑、革新全球化发展模式，致力于摒弃霸权主义、变革国际秩序，致力于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构建多元现代化发展理念和推动世界的繁荣发展。然而，西方既得利益集团在全球治理中的效能持续衰退，特别是其国内政治极化加剧，致使保护主义与逆全球化浪潮蔓延，单边主义政策泛滥导致全球治理危机频发，意识形态领域的极端化与分裂化趋势日益凸显，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鉴于此，必须基于全球化与现代化的深层发展逻辑，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重塑人类文明发展图景。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方政治极化 全球治理体系 人类文明

【作者简介】杨润聪，法学博士，中国地质大学（北京）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2026）01-0022-17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我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研究”（23CKS040）的阶段性成果。

当今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全球治理赤字持续扩大，国际社会多维矛盾交织演变。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怎么应对这个变局，这是个时代之问、世界之问。我给出的答案就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①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站在全人类立场上，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做出的倡议与行动，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然而，在当前的“中心—边缘”秩序之下，西方国家政治极化产生多重负面外溢效应，使经济全球化出现逆流，阻碍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向实践转化的进程。

既有研究表明，西方政治极化蕴含特定政治哲学逻辑，其外溢效应对全球经济政治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② 美国作为西方政治极化的典型，以威胁认知主导外交决策，^③ 呈现鲜明的对抗性与功利性，^④ 尤其加剧了亚太地区的战略风险。^⑤ 政治极化在英国表现为竞争的溢出与异化，^⑥ 在普遍受右翼民粹主义浪潮冲击的欧洲其他国家，政治极化在重塑地区政治光谱与政党格局的同时产生复杂的外溢效应，给中欧合作带来新挑战。^⑦ 在此背景下，亟须从全球发展的实践创新、动力机制优化以及价值理念凝聚等层面突破结构性困境，进而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意义

“人类命运”理念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作为系统性存在的本体论基础上的文

① 《习近平会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人民日报》2024年4月27日。

② 参见周穗明：《右翼民粹主义、西方政治极化及其潜在的政治哲学逻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4年第4期，第161~168页。

③ 参见刘国柱：《威胁认知、政治极化与美国外交政策》，《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2年第6期，第34~43页。

④ 参见李捷：《美国对华政治极化与涉疆虚假人权叙事》，《当代传播》2021年第4期，第69~72、102页。

⑤ 参见韦宗友：《美国政治极化与亚太战略风险》，《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4年第20期，第94~101页。

⑥ 参见庞金友、张鑫宇：《竞争的溢出与异化：当代英国政治极化的逻辑与影响》，《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2024年第4期，第109~118页。

⑦ 参见卜永光：《民粹主义浪潮下的欧洲政治极化态势》，《当代世界》2024年第4期，第64~69页。

明演进的必然选择。经济全球化打破了民族国家界限,推动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使人类在物质、技术、信息层面深度互联,确立了人类文明的整体性。然而,在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人类社会,其利益分配、资源占有和规则制定的权力集中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手中,形成了一种高度不对称的全球控制体系,这种以资本为中心的秩序造成南北发展鸿沟、东西方地缘对抗等结构性矛盾,使人类命运面临不确定性。面对“人类社会应该向何处去”^①的“世界之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应运而生。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旨在超越资本逻辑的局限,通过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引导多元主体在国际社会实践中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共同开辟人类文明更加美好的发展前景。

(一) 扬弃西方资本逻辑,革新全球化发展模式

“世界之问”源于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审视资本全球扩张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将资本逻辑置于人类历史发展整体中考量,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资本逻辑的关键所在。

毫无疑问,资本驱动下的全球化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但资本主义在特定历史阶段的合理性并不意味着其具有历史永恒性和唯一性。资本创造的巨大物质财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资本逻辑的内在矛盾,使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和系统性危机被暂时合理化,以至于宣扬资本主义制度的历史永恒性和唯一性的社会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事实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构建的“进步叙事”与其全球扩张带来的系统性危机之间存在深刻的断裂。在以资本增殖为根本导向的全球化模式下,当资本增殖遭遇阻碍时,“单边主义”“脱钩断链”“小院高墙”等逆全球化浪潮便随之涌现,这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制度蕴含的结构性缺陷与内生性风险。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西方学界已出现对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反思,瑞安·库珀(Ryan Cooper)认为资本主义无法避免周期性危机,并且在主动制造无谓的痛苦。^③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① 习近平:《同舟共济克时艰,命运与共创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21年年会开幕式上的视频主旨演讲(2021年4月20日,北京)》,《人民日报》2021年4月21日。

② 陈曙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改变世界》,《马克思主义研究》2023年第2期,第56页。

③ 参见 Ryan Cooper, *How Are You Going to Pay for That? Smart Answers to the Dumbest Question in Politics*,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2022。

Piketty) 认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平等并非经济或技术的自然产物, 而是由意识形态和政治选择主动构建并维护的系统性不公正, 并提出了“参与式社会主义”, 强调唯有意识形态变革才能打破不平等的再生产机制。^① 这些学者的反思和研究或许预示着全球化模式转型的历史契机正在形成。但是, 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遮蔽下的“改良”无法真正跳出资本逻辑下的认识误区, 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坚守全人类共同价值, 切实实现了对资本逻辑的超越。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为解决全球化问题而给出的中国答案, 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重构国际议事规则、治理体系与分配秩序。“共商”倡导多边对话与平等协商, 将多元主体的合理关切纳入全球议程设置, 推动全球决策模式实现通过协商生成共识; “共建”平衡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的权责关系, 重构全球治理体系, 奠定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基础; “共享”突破资本逻辑的固有桎梏, 通过缩小南北差距实现发展成果普惠, 彰显以经济深度互联为核心的全球化本质。整体来看,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为努力目标, 这是对资本霸权逻辑衍生的干涉主义、霸权主义、利己主义、孤立主义和生态恐怖主义的辩证超越, 在承认资本历史性价值的基础上实现了对资本逻辑唯一性的祛魅, 实现了实践哲学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性方案的范式革命, 为充满不确定性的全球化动能转型注入了稳定性与确定性。

(二) 摒弃霸权主义, 为变革国际秩序提供方法论指引

改变人类命运, 最终落于实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 “什么样的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体系对世界好、对世界各国人民好, 要由各国人民商量, 不能由一家说了算, 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并非某种既定的、不可改变的宿命安排, 它着眼全人类共同利益和共同福祉, 站在人类前途命运的高度, 打破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 为变革国际秩序提供了方法论指引。

霸权主义是西方资本逻辑在国际秩序中的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变革霸权主义国际秩序的方法论以发展逻辑取代掠夺逻辑, 即通过多元主体的

① 参见 Thomas Piketty, *Capital and Ideology*, trans. Arthur Goldhammer,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20, p.7。

②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 年 7 月 1 日)》,《人民日报》2016 年 7 月 2 日。

协同发展削弱西方资本的统治力，进而在平等协商基础上构建包容性的全球治理体系。这就需要平衡多元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利益分配关系，赋予多元主体参与全球治理的真正的主体性地位。然而，这一理念与西方中心主义存在根本性对立，必然冲击西方国家依托历史优势确立的国际秩序特权。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的：“过去一切阶级在争得统治之后，总是使整个社会服从于它们发财致富的条件，企图以此来巩固它们已经获得的生活地位。”^①当前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体系正是这种统治逻辑的当代延续——它们通过制定规则维护自身利益，使国际秩序长期固化于不平等状态。中国外交部发布报告《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指出美国滥用政治、军事、经济、金融、科技文化等领域的霸权，“对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合则用，不合则弃、则废，打着‘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旗号，谋着维护自身‘家法帮规’的私利”。^②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世界各国团结协作、反抗霸权主义提供方法论指引。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倡导通过凝聚多元主体力量，“践行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③以广泛的参与和协作，削弱资本的全球掠夺能力，形成更公平的利益分配关系，“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④实现对不合理国际秩序的深刻变革。同时，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由“虚假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的过渡^⑤具象化，以共同构建发展国际主体之间的协作关系为方法论基点，使各国能够真正以主体身份主动参与全球化进程，为全球南方国家摆脱霸权主义束缚提供方法论指导，使其能够更自信、更全面、更有效地审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的关系，从而改变被动卷入全球化的窘境。从整体上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各国具体实践中实现了本土化再造，通过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② 《美国的霸权霸道霸凌及其危害》，《人民日报》2023年2月21日。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2022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

⑤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页。

国家间制度对接、项目共建与治理协同，将宏大叙事转化为普通民众可感知、可参与、可受益的日常实践，进而凝聚反剥削、反压迫的多元主体力量参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这突破了民族国家的地理疆界，超越了短期利益的狭隘视野，打破了以实力界定权力的旧有逻辑，推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朝着有利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方向发展。

（三）超越意识形态对立，构建多元现代化发展理念

对霸权主义的解构并非终点，改变人类命运还要完成发展逻辑的构建。具体而言，就是要推动世界各国探索立足自身发展实际的现代化模式，实现全球生产力普遍提升。这就需要在思想上澄清被资本主义意识形态长期遮蔽的全球化、现代化和民族化之间的关系。

全球化背景下的意识形态冲突主要围绕现代性与民族性矛盾叙事展开。为了维持西方霸权地位、固化国际秩序并维护既得利益，西方资本势力推动意识形态泛工具化，将西方现代化模式塑造为有效参与全球竞争的最优模式，将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中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矛盾转换为民族化与现代性的矛盾，再转移为意识形态领域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试图挑起民族性与现代性的对立，进而将西方现代化先发优势伪装为意识形态现代性优势以压制民族性，通过意识形态输出与渗透消解非西方国家民族主体性，攫取非西方国家意识形态主导权，实现经济殖民与精神殖民的双重控制。因此，非西方国家发展道路中民族化与全球化的矛盾是非西方国家对自身主体性的维护与西方国家借全球化之名实施资本入侵之间的矛盾，是不同主体之间的矛盾，而不是非西方国家在独立发展过程中自身的民族化与全球化、现代化之间的矛盾。进一步看，无论是发展道路中民族化与现代性的矛盾，还是意识形态领域中民族性与现代性的矛盾，都建立在民族多样性和现代化唯一性的基础上，而多元意识形态共生、共存，是当前历史阶段的客观现实。因此，一方面，西方国家对其现代化模式的优越性与唯一性的渲染不仅难以维系其霸权地位，反而可能诱发全球意识形态的非理性对抗；另一方面，西方国家通过意识形态叙事强调“一元现代性”，否定“多元现代性”，强行渲染现代性与民族性、文化主体性之间的矛盾，遮蔽了全球化、现代化、民族化三者之间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统一于人类发展基本模式的实质，并基于意识形态排他性挑起全球范围的意识形态对抗，严重阻碍全球化的健康有序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全球化背景下意识形态冲突的整体性超越。人

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支持世界各国发展道路多样化,主张在保持民族国家主体性的同时实现现代化,接受多元意识形态共生、共存的现状,反对意识形态相互对立和攻击,为凝聚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建立思想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经验向世界宣告:民族性不仅可以与现代性共存,而且是现代性的根基;现代化绝非割裂与否定民族化的空中楼阁,而是扎根民族文化沃土的创新性发展,二者并非处于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而是在历史进程中相互成就、辩证统一的有机整体;每个民族国家都有“基于自身国情自主探索”^①的权利。中国式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彻底打破了西方现代化模式唯一性的神话,并进一步证明民族性与现代性结合能够开辟多元现代化道路,这既是世界多极化格局形成的深层动因,更是其持续演进的内在要求。

二、西方政治极化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多维挑战

人类命运共同体致力于革新全球发展模式,推动国际秩序变革,超越意识形态对立,其构建必然会受到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而西方政治极化及其外溢影响已经成为影响国际政治环境的重要变量。在政治学领域,“极化”特指政党政治与政策主张的极端化。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看,政治极化是资本主义制度内在矛盾在政治领域的投射。资本的无序竞争导致资产阶级分化为不同资本集团,不同资本集团在具体利益诉求上存在结构性差异,这种差异会通过其政治代理人(政党)的行为和意识形态话语表现出来。当资本集团间的利益分配相对均衡时,政治斗争表现为温和的党派轮替;而当资本利润率趋于下降、市场扩张遭遇瓶颈时,各垄断资本集团对剩余价值的争夺便会急剧激化,这种经济基础层面的矛盾通过政党斗争和意识形态对抗等形式在政治领域充分显现,最终形成政治极化现象。总体上看,政治极化是西方资本势力企图通过政治手段解决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尝试,但资本逻辑下的“自救”注定难以成功,并且政治上层建筑的盲动势必会向观念上层建筑——意识形态扩散,使其内蕴的以利己主义为核心的多元意识形态极端化,并随资本全球影响力扩散。这一传递链条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通过观

^① 习近平:《携手同行现代化之路——在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上的主旨讲话(2023年3月15日,北京)》,《人民日报》2023年3月16日。

念上层建筑反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的机制形成对冲，对其以观念共识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价值追求产生负面影响。

具体而言，西方国家在后工业时代普遍出现的去工业化趋势加剧了其阶层固化、圈层撕裂等问题，而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导致西方资本的全球掠夺能力减弱，资本集团被迫转向对存量利益的争夺，这使西方政治极化持续加剧，具体体现为党派斗争激化、社会共识难以凝聚、民粹思潮蔓延、边缘宗教派别介入政治、种族主义抬头、多元文化主义加速扩张以及意识形态对抗升级。在资本逻辑驱动的全球化和西方资本主导的世界秩序之下，西方国家内部的政治极化问题外溢并产生全球性影响。美国作为西方世界霸主，悍然推行保护主义，实施资本收缩，否定经济全球化，并奉行单边主义外交政策，破坏国际秩序；欧洲国家在美国的钳制与诱导下，其固有的民粹主义、多元主义与分裂倾向泛滥；其他西方国家缺乏经济、政治、安全上的独立自主性，对多元极端意识形态的国际传播推波助澜。总之，政治极化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的基础，阻碍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的落地和国际社会共识的形成，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成多维挑战。

（一）逆全球化侵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基础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基于人类社会整体性和世界历史发展必然性，对当前全球化发展模式的超越与重构。然而，当前西方政治极化加剧了逆全球化，这不仅削弱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经济与制度基础，而且动摇了全球合作与共同发展的现实支撑。

当前的逆全球化现象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孤立主义的回潮，而是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累积与政治极化交织作用下的新型民粹化和保护主义浪潮，表现为一种以本国民粹情绪为政治动员基础、以经济胁迫和贸易壁垒为政策工具的民粹式保护主义。这种政策并非真正的“自我孤立”，而是在资本扩张受阻时，通过排他性政策和单边行动实现资本再分配与区域重组，从而在形式上表现为逆全球化。逆全球化在本质上是资本扩张受阻时的暂时性收缩策略，试图实现资本增长从“全球剥削”向“区域重组”的适应性调整。从表面上看，逆全球化是对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后西方资本利用商品、军事、科技、金融进行全球掠夺的“定式”的“否定”，但在实质上并未改变资本攫取剩余价值的本质，也未真正调整国际利益分配格局，并且会破坏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冲击甚至阻断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发展进程，引发系统性风险。

政治极化使民主政治变为政党牟利手段,极端化转向使政党之间立场差异扩大、政治共识减少,从而陷入“妥协困境”,在民粹政治推动下国家对外政策剧烈摇摆并缺乏连贯性,更是加剧了逆全球化。在资本运转逻辑下,这一趋势呈现以美国为中心向全球扩散的结构性分层格局。特朗普政府在其第二任期伊始重新推出大范围关税措施,试图通过贸易战压缩逆差并复兴制造业,但这一行为在全球报复性反应下产生明显的负面后果,^①严重扰乱全球经济秩序与供应链稳定,令全球贸易面临前所未有的政策风险。^②法国和德国经济政治生态日益受制于以美英金融资本为核心的国际资本逻辑,并且德国绿党等推动的能源转型与环保政策加剧了去工业化趋势和欧洲产业资本的外流风险。在这一过程中,欧洲多国民族主义情绪高涨,使反对自由贸易、影响经济政策成为主流议题;^③西方国家不断强化安全审查、关键矿产战略以及技术合作管控机制,资源贸易和技术合作呈现更加明显的限制性。在政治极化推动下民粹主义、保护主义与反全球化合流,这不仅造成全球价值链断裂,而且重构了区域经济壁垒,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倡导的共同繁荣、开放包容理念背道而驰。政治极化之下政策的摇摆不定不仅反映了西方国家内部资本集团之间矛盾尖锐,而且反映了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难以调和,严重削弱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蓝图所需的实践基础。

(二) 单边主义阻碍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秩序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追求的国际秩序以世界多极化和多边主义为基础,以求实现多元主体协同发展,这种坚持各国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共同发展的立场与极端政党的单边主义政策倾向存在明显差异。

单边主义是主权国家基于短期利益最大化,无视国际秩序和他国利益,单方面肆意推行对外政策的霸权行径,在本质上是国内政治结构性异化在国

① 参见 Anna Ignatenko, Ahmad Lashkaripour and Luca Macedoni et al., Making America Great Again? The Economic Impacts of Liberation Day Tariffs, CESifo Working Papers, No.11890, 2025。

② 参见 Syed Rizwan Haider Bukhari, Syed Umair Jalal and Muhammad Ali et al., America First 2.0: Assessing the Global Implications of Donald Trump's Second Term, *Qlantic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ol.6(1), 2025, pp.51-63。

③ 参见 Douglas Dow and Ilya R. P. Cuypers, The Influence of Societal Nationalist Sentiment on Trade Flows,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Policy*, Vol.7(1), 2024, pp.64-98。

际关系中的体现。在政治极化之下，极端政党为最大限度地赚取政治利益，将复杂多变的国际事务简化为民粹主义叙事，^① 为了迎合选民牺牲人类长远利益，奉行对抗性单边政策。例如，美国政府基于“美国优先”的狭隘利益观，“三进三退”《巴黎协定》，使全球气候政策在民主党和共和党的交替执政中反复摇摆并沦为政治工具；^② 英国“脱欧”不仅重构其与欧盟的关系，而且引发全球对区域合作机制稳定性的广泛担忧；^③ 澳大利亚近年来频繁出台贸易制裁、外交对抗等单边政策，造成亚太地区信任危机。^④ 单边主义造成的治理失衡，反映了西方资本主导的全球化已使国内政治矛盾转化为全球治理体系的“权力—义务”非对称性危机，西方资本希望维持现有国际秩序，但缺乏引领世界治理的能力与资源，最终选择单边主义，这实际上“背离”了西方中心主义下的国家秩序。

政治极化使西方执政党更多关注本国民众的短期情绪，而非国家战略的长远结构性安排，使全球治理中的权利与义务、平等与信任进一步失衡，放大了单边主义对全球治理体系的危害，导致国际协作中的信任赤字扩大。挪威前首相格罗·哈莱姆·布伦特兰（Gro Harlem Brundtland）指出，许多欧洲领导人“即使是在基本问题上也将不再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可以信任美国”。^⑤ 极端政党对单边主义的工具化滥用消耗了西方国家在构建现行全球化体系过程中长期竭力维护的国家信誉软实力。这一现象亦折射出影响国际秩

① 参见 Berta Barbet, Antoni-Italo de Moragas and Guillem Vidal, Stories Beat Experts: A Survey Experiment on Political Persuasiveness, *European Journal of Political Research*, Vol.63(1), 2024, pp.383–394。

② 参见 Stefan C. Aykut, Felix Schenuit and Jan Klenke et al., It's a Performance, Not an Orchestra! Rethinking Soft Coordination in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 *Global Environmental Politics*, Vol.22(4), 2022, pp.173–196。

③ 参见 Benjamin Martill and Øyvind Svendsen, The Populist Challenge to Multilateral Diplomacy: Brexit and the Demise of UK–EU Security Coope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ugust 17, 2025, <https://doi.org/10.1177/13540661251363678>, 2025 年 10 月 16 日。

④ 参见 David Hundt, “It's Nothing Like the China Market” : Australian Corporate Elites and the Securitisation of Trade, *Australi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Vol.79(5), 2025, pp.738–754。

⑤ Steven Erlanger, Europe Wonders if It Can Rely on U.S. Again, Whoever Wins, Th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22, 2020, <https://www.nytimes.com/2020/10/22/world/europe/europe-biden-trump-diplomacy.html>, 2025 年 10 月 16 日。

序的动力的变迁：非西方国家群体性崛起，削弱了西方资本的传统支配能力，致使西方国家试图通过制度性手段破坏既有秩序，以维护其日益缩减的垄断利益；同时，非西方行为体基于发展实践差异，提出系统性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诉求。整体来看，西方主导的既有国际治理体系既在制度韧性上受到质疑，又面临体系调整转型的集体行动困境，这就需要所有国际行为体共同参与人类命运轨迹的形塑。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不能走西方国家基于霸权强制力开辟全球化的老路，而是要走植根于国际主体平等互信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路，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人类文明整体进步。然而，当前国际主体间的信任危机严重制约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制度落地，使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遭遇制度性困境，削弱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际共识基础。

（三）极端意识形态纷争影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国际认同

解决“人类向何处去”的世界之间的关键在于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而实现共同发展必须建立在正确认识并践行共同价值的基础之上。唯有如此，才能超越国家、阶层、文化乃至意识形态层面的分歧，凝聚起以人类整体利益为出发点的价值共识，这正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可或缺的思想根基。然而，在政治极化之下，西方国家社会分裂日益严重，价值理念极端对立，价值共识难以凝聚，意识形态领域斗争激烈。这与主张消除意识形态对立、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背道而驰。

意识形态是为政治主张提供合理性辩护的工具，受政治极化的影响最为直接。从一般意义上看，意识形态维护统治阶级整体利益，但是当阶级内部利益分化加剧时，便会催生具有不同立场的政党以及侧重于维护具体利益的意识形态，利益矛盾的激化会进一步使多元意识形态极端化，导致不同意识形态之间相互排斥、纷争不止，呈现多元极端意识形态共存、斗争的混乱局面。在美国，自由派与保守派围绕种族、性别、教育、移民等议题的意识形态对立愈发极端。例如，拜登政府倡导性少数群体权益并推行相关政策，到了特朗普政府时期这些政策就遭到了保守派的强烈反制，特朗普政府出台了“跨性别者参军禁令”^①“保护女性免受性别意识形态极端主义影响并恢复联邦

^① 参见 Michele Goodwin and Erwin Chemerinsky, *The Transgender Military Ban: Preservation of Discrimination through Transformation*,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Law Review*, Vol.114(3), 2019, pp.751-807.

政府对生物学真理的认知”^① 等政策，将之作为政治和意识形态驱动的政策棋子。^② 同样的极化趋势也出现在欧洲，尤其是在一些南欧和东欧国家，政治极化趋势尤为显著。^③ 例如，匈牙利的左翼和右翼政党集团通过渲染“西方现代性”与“民族保护”的对立，成功制造了公众层面的认知分歧；^④ 当前，西欧社会结构正在经历深刻重塑，高等教育扩张催生新兴“认知阶层”，移民热潮带来族群结构的深刻调整，代际更替则不断加深价值观念的断层，^⑤ 这些变化共同加剧了社会内部的分裂，导致越来越多曾支持主流政党的选民转向支持极端政党。^⑥ 荷兰极右翼政党自由党领袖海尔特·维尔德斯（Geert Wilders）在 2023 年选举中胜出，其将移民与恐怖主义挂钩的政治叙事获得主流民意支持。^⑦ 英国、瑞典等国也纷纷采取意识形态“退群”策略，对中国、伊斯兰世界甚至本国少数群体进行制度性排斥。激烈的极端意识形态之争从表面上看是“民主”“自由”的象征，在实质上是不同资本集团借助选民之手夺取政治话语权的手段，这也从侧面反映了极端政党将意识形态工具化的问

-
- ① 参见 The White House, *Defending Women from Gender Ideology Extremism and Restoring Biological Truth to the Federal Government*,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defending-women-from-gender-ideology-extremism-and-restoring-biological-truth-to-the-federal-government/>, 2025 年 10 月 16 日。
- ② 参见 CQ Quinan, *From Criminalization to Erasure: Project 2025 and Anti-trans Legislation in the US*, *Crime Media Culture*, Vol.21(4), 2025, pp.529–547。
- ③ 参见 Veronika Patkós, *Measuring Partisan Polarization with Partisan Differences in Satisfaction with the Government: The Introduction of a New Comparative Approach*, *Quality & Quantity*, Vol.57(1), 2023, pp.39–57。
- ④ 参见 Agnes Gagyí, “Coloniality of Power” in East Central Europe: External Penetration as Internal Force in Post-socialist Hungarian Politics,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Vol.22(2), 2016, pp.349–372。
- ⑤ 参见 Robert Ford and Will Jennings, *The Changing Cleavage Politics of Western Europe*,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23(1), 2020, pp.295–314。
- ⑥ 参见 Vincenzo Emanuele and Bruno Marino, *Party System Ideological Polarization in Western Europe: Data, Trends, Drivers, and Links with Other Key Party System Properties (1945–2021)*, *Political Research Exchange*, Vol.6(1), 2024, <https://doi.org/10.1080/2474736x.2024.2399095>, 2025 年 10 月 16 日。
- ⑦ 参见 Pola Cebulak and Florian Lippert, *Shocks to the System: Lessons from Geert Wilders’ Victory in the Dutch Elections*, February, 2024, <https://www.kew.org.pl/wp-content/uploads/2024/02/Protecting-European-Values-Shocks-to-the-System.pdf>, 2025 年 10 月 16 日。

题。意识形态工具化滥用进一步反映了西方国家社会撕裂严重,党派分歧和意识形态壁垒使社会思想共识难以形成,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愈加困难。

在“中心—边缘”的世界体系结构下,非西方国家的社会运转逻辑受西方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深刻影响。西方国家政治极化引发的意识形态共识瓦解,会通过全球权力结构的不对称依赖关系对非西方国家产生外溢效应,使由西方国家主导维系的“自由秩序”陷入认同危机。2025年,特朗普启动美国对外援助项目审查,^①导致美国国际开发署这一老牌意识形态输出机构的关闭,并退出相关国际组织,导致新自由主义这一西方意识形态输出的核心价值日渐式微。这一缺口迅速被民粹主义势力填充,其宣传的极端保护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严重削弱了既有意识形态秩序的稳定性和韧性,形成了一种多元极端意识形态纷争的恶性循环,致使不同阵营的民众相互敌视,交流与合作意愿降低。中国作为长期以来西方势力意识形态攻击的对象,在这场意识形态纷争中遭受前所未有的诘难。此外,美国、欧盟、英国、瑞典等都在官方层面提出对华战略调整或限制措施。这种基于意识形态偏见的认知封锁,使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面临被标签化的风险,阻碍其凝聚全球价值共识目标的实现。

三、西方政治极化态势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路径

西方政治极化在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多维挑战的同时,其暴露的资本主义制度困境又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时代契机。面对这一矛盾统一体,需要在把握世界历史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系统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的实践落实,形成发展、治理、安全、文明一体推进的多层次应对策略体系。

(一) 引领全球化发展多元模式,推动全球发展实践创新

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指出的,“只有不断发展,才能实现人民对生活安康、社会安宁的梦想”。^②

^① 参见 The White House, Reevaluating and Realigning United States Foreign Aid, January 20, 2025, <https://www.whitehouse.gov/presidential-actions/2025/01/reevaluating-and-realigning-united-states-foreign-aid/>, 2025年10月16日。

^② 习近平:《构建高质量伙伴关系 共创全球发展新时代——在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上的讲话(2022年6月24日)》,《人民日报》2022年6月25日。

逆全球化的资本收缩叠加政治极化的政策摇摆，正在将世界拖入“新冷战”式发展陷阱。对此，应从思想和实践层面祛除对西方资本逻辑的依附，把握发展自主权，自主探寻发展道路，推动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格局，创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新模式。

构建包容多元的现代化理论体系。在政治极化之下，西方现代化模式对非西方国家的辖制也愈加严重。而中国式现代化通过中国自身的成功经验，证明了现代化模式的多样性，打破了“现代化=西方化”的叙事逻辑，为构建满足未来全球化发展趋势的多元世界现代化理论体系奠定了基础。应加快构建融通中外的中国式现代化话语体系，用学术化、故事化、案例化等多维方式，阐释中国式现代化的原理与实践，并通过学理分析和历史比较，揭示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内在矛盾、经济掠夺性以及对中国国家的局限。同时，应系统总结不同国家探索现代化的经验，比较不同政治体制与社会制度的治理效能，助力全球南方国家探索自主发展道路、根除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思想殖民。

推动完善互联互通的全球发展平台。政治极化造成国际规则碎片化、技术标准阵营化、关税武器化的程度不断升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环境日趋恶化。对此，应向世界表明中国坚持合作共赢的理念、主动承担国际责任的决心，深化“一带一路”倡议、南南合作、上海合作组织、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多边合作机制，推动发展中国家在基础设施、产业链、能源、数字经济等领域的协同与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应发挥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器”作用，支持东盟、非盟、阿盟等区域组织提升区域经济韧性，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物质基础，增强世界经济的抗风险能力。

倡导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在政治极化中，政党利益之争主导政策制定，国际发展合作被边缘化，导致政府对外政策因无法协调“国内维稳”与“国际责任”之间的关系而缺乏稳定性与确定性，进而导致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不足。全球发展倡议为破解发展赤字提供了重要路径，不仅强调各国自身的发展，更强调国家间的合作与共同发展。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全球发展倡议着眼“全球共同发展的长远目标和现实需要，凝聚促进发展的国际共识，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推动世界各国共同发展进步”。^① 因此，应当推动

① 习近平：《共迎时代挑战 共建美好未来——在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第十七次峰会第一阶段会议上的讲话（2022年11月15日，巴厘岛）》，《人民日报》2022年11月16日。

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加强减贫、粮食安全、绿色转型、工业化、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领域的国际合作，将发展共识转化为务实行动，为推动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落实注入新动力。

（二）革新优化动力机制，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

全球治理体系指国家行为体、非国家行为体、超国家或跨国家行为体以及次国家行为体等多元主体为解决国际社会中的跨国问题而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复杂系统。全球治理体系的有效性取决于参与主体的合作意愿、规则合法性与体系适应力。然而，当前西方政治极化导致国内决策极端化、外交民粹化和单边主义盛行，全球治理体系的多元主体之间分裂、对抗愈加严重，削弱了国际合作的基础。应对这一困境，需要以全球治理倡议为引领，从合法性、执行力、适应性等方面推动多边治理体系的结构优化。

探索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元共治全球治理体系。全球治理应当是建立在全球历史视野下的治理，以人类社会最全面的主体性应对全球共同挑战，实现人类共同繁荣发展。然而，单极霸权体系下的国际秩序固化不公，政治极化进一步加剧西方国家内部利益分化，使其在全球治理中缺乏稳定性与道义感。因此，应坚持以联合国为核心、以主权平等为原则、以多元共治为特征，坚决捍卫联合国宪章，捍卫人类共同利益，为推动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作用提供有力支持，共建统筹和平与发展、安全与稳定、效率与公平的全球治理体系。

提升全球治理体系中国际法的实施效能。当前，政治极化导致西方国家的国内政治困境日益凸显，西方国家为迎合国内民粹情绪，将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之上，肆意实行单边制裁与长臂管辖，任意排斥和强迫他国，严重违反国际法的一般性原则，造成国际法执行力衰减。鉴于此，必须坚持尊重和遵守国际法，强化国际法的权威性与执行力，在统筹协调国际、代际、种际以及区域间、群体间多个维度的利益关系的基础上，发挥中国综合国力优势，在经济、军事、舆论等方面坚决反制霸权霸道行径，彰显大国责任，践行全球安全倡议，落实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从法律、制度与政策三重维度推动全球安全治理的制度化建设，构建以合作代替对抗、以对话代替冲突的国际安全机制。

增强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时代适应力。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东升西降”的国际格局变化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关系准则迫切需要

实现自我更新，既要克服西方政治极化之下单边主义泛滥对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破坏，又要推进国际准则对新兴力量诉求的吸纳。例如，在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之后，新兴力量快速构建的替代体系《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成为新规则的代表，这种以多边主义为导向的制度创新正体现全球治理的多极化趋势。因此，需要彰显大国实力，反对霸权主义，强化全球治理倡议的制度创新功能，根据新型全球化发展需要，推动国际秩序变革，尤其是要鼓励新兴力量创建规则样板，为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合理化注入“强心剂”。

（三）传播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凝聚全人类价值共识

当前，政治极化之下西方内部矛盾冲突削弱了其国际战略的协调性，西方自由主义价值体系陷入内部分裂，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传播提供了思想机遇。因此，应把握时机，以全球文明倡议为引领，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牢笼，增强中国话语的国际传播能力与斗争意识，向世界讲述好共商共建共享理念，阐释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这一新的文明愿景，推动不同文明平等对话、交流互鉴，形成超越意识形态对抗的人类共识。

建构全球化视野下的国际表达体系，彰显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兼容性与亲和力。应基于文明倡议视角，以“发展”这一人类共同追求为基石，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多元文明价值系统相结合，构建具有兼容性与亲和力的全球话语体系。正如马克思指出的，“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 [ad hominem]”。所谓彻底，就是抓住事物的根本”。^①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根本”，就是对人类世界根本性问题的阐释与解答。这就需要加大经济、行政、科技等方面的支持力度，引导我国学界、智库界强化斗争意识，发扬批判精神，聚焦“资本逻辑”“全球治理失衡”等议题组建跨国学术共同体，发布系列批判性研究报告，量化评估国际规则、投资贸易中的依附性问题，创设全球发展公正性指数等替代性分析工具。同时，应进行差异化调试，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多元文明价值系统相结合，构建“区域版本”话语库，从而提升治理方案与实践路径的在地化认同。要在深刻揭示资本逻辑侵蚀国际制度的弊端的同时，提供切实可行的替代性方案，完成从“破”到“立”的闭环。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0页。

优化海外传播的组织机制与媒介布局,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传播的系统性与战略协同性。应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海外传播效能,突破单一主体发声的局限,构建多层次、多主体协同联动的传播共同体。在组织机制上应统筹协调党政外宣、驻外机构、国际智库合作平台等资源,推动跨部门协作与议题联动,从而建立常态化的国际传播战略规划机制,激活地方与民间传播资源,从而拓展多元主体参与的实践空间并构建立体化传播网络。在媒介布局上,应结合数字传播趋势,充分发挥中国国际电视台、新华网海外版等主流媒体的外宣能力,强化在全球主流社交平台、内容聚合平台、新兴传播网络和地区性平台上的发声能力,维护我国互联网传媒公司海外权益,构建适应移动端、多语种、图像化的新型国际传播内容体系。同时,应重视舆情反馈机制构建,打造多层次海外受众认知评估系统,实现理念传播的动态调整与精准投放。

推动理念与实践融合转化,构建共商共建共享理念的可视化国际认同场景。马克思指出:“思想本身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思想要得到实现,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①要激发“人”的力量,就要汇聚“人”的思想共识,共识的形成根植于理念在实践中的落地与真实体验。为此,应将共商共建共享理念与中国—东盟、中国—非洲、中国—拉美等区域命运共同体建设深度结合,以切实的物质性合作成果和发展红利,在全球南方构建起“命运共同体”的共同记忆与共识基础,真正实现以文明共情和情感共识化解价值隔阂。应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与现有国际合作机制、区域发展项目和公共产品提供机制深度结合,致力于在发展援助、卫生合作、消除贫困、生态保护、教育交流等方面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转化为共商共建共享的行动。应推动高校联盟、青年交流、媒体互访、非遗合作等文化与教育项目,打造多样化、可体验的认知场景,使国际受众能够从日常接触中获得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情感认同与价值认同,让理念传播超越文本层面进入社会互动与价值认同层面,构建跨文明共识的可视化认同场景,使理念认同转化为行动共识,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由“国家倡导”转向“社会参与”、由“政策话语”转向“价值共识”。

(责任编辑:李润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20页。